

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

(1941~1979)

〔日〕山极晃 著
鹿锡俊 译

原著 :1997 年 4 月出版
翻译 :1999 年 8 月定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序 言

我很高兴能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向大家介绍我的老朋友山极晃教授的大作。

山极晃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特别致力于中美关系、日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研究。自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博士课程毕业后，先后任职于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横滨市立大学和二松学舍大学，1980 年代与 1990 年代，还两度作为日方派遣学者，在上海复旦大学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讲学。数十年耕耘不息，不仅在教书育人上桃李满天下，在学术研究方面也硕果累累。

这本题为《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的论文集，就是这些硕果的一个代表。其中所收的 10 篇论文，大多成稿于中日、中美建交之前。如作者在自序中所指出的，这是一个政治上中日严重对立、中美激烈对抗的年代，因而也是一个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极为有限”，“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都极受限制”的年代。但惟因如此，中国读者就更有兴趣通过这本论文集来了解：在那样一种年代，“一个日本的研究者是怎样看待中美关系史

的”。我想，认真读完本书的读者，大概都会同意我的结论，即：这个“日本的研究者”——山极晃教授，是以不随风摇摆，不趋炎附势，一切从客观材料出发，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观察历史与分析历史的。所以，尽管写作年代久远，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难免存在不充分的或该批判的地方”，但就整体而言，它仍然以其精深的内容而给读者以新鲜的感觉，并告诉人们：真正的学术成果，为何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译者鹿锡俊博士是我的学生，从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到目前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而在日本的大学讲授日本外交史与东亚国际政治史，多年身受山极晃教授的指点与关照。这次他以最实际的行动对这一切作出了应有的报答。作为一个最清楚鹿君在翻译过程中所付出的牺牲与心血的人，我感到深深的欣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中国的知名出版社。在现今因注重“成本核算”而对学术著作敬而远之的风气中，该社欣然出版山极晃教授的著作。我不能不对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今天，与冷战时代相比，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许多方面又都出现了新的问题与新的挑战。为了避免重犯本书所究明的那些过去的错误，我们格外需要从重温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为此，我们也格外需要发扬本书著者、译者与出版社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可贵的学术态度与精神。这也许可说是本书在今日的又一种重要意义吧。

汪 熙

2001年11月

于复旦校园

中文版序言

承蒙因中美关系史的卓越研究而驰誉国际的复旦大学名誉教授汪熙先生的厚意，本书得以出版中文版。作为作者，我在蒙受这一巨大光荣的同时，为本书由此而获得被广大中国读者阅读的机会，感到无上的喜悦。为此，我衷心地向汪教授表示感谢。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副教授鹿锡俊博士承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他最近刚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题为《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政策：1931～1933》的专著，是一位年富力强、精通日语的东亚国际政治史学者。他为这项工作挤出了宝贵的研究时间，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每遇疑点或意义暧昧之处，都不厌其烦地同作者本人商榷，从而正确地完成了译作。值此机会，谨向他致以深深的谢意。

关于本书的意图与结构，已在序章中说明，各位可参照该章。我在此只想补充一点，即：收入本书的论文，大多写作和发表于中美、中日尚未建交的时期。就这一点来说，我想中国读者可能会有兴趣了解：在相互交流极为有限的岁月，一个日

本的研究者是怎样看待中美关系史的。

另外，由于这些论文是在资料条件和研究条件都极受限制的状况下撰成，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难免存在不充分的或应该批判之处。特别是，当时仅能接触到很少的中国方面的资料及研究成果。从这一经验出发，我切身感受到：要使研究获得进展，资料的开放和相互交流、相互批判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我希望今后各国在资料开放方面更有进展，并期待中国的读者能赐以积极的批评与指教。

最后，谨向为本书的出版而竭尽努力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致以深切的敬意和谢意。

山极 晃

2001年4月

目 录

序 章	1
一 1940 年代的中美关系	1
二 对立的年代	6
三 中国问题的国内政治化	10
四 关于本书的若干说明	12
 第一章 美国的对华政策论争：1941~1972	13
一 导 言	13
二 二战期间的对立	14
三 二战以后围绕对华政策的论争	20
四 麦卡锡的登台	24
五 朝鲜战争与两个听证会	28
六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代	32
七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	36
八 从约翰逊到尼克松	41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美关系	51
一	美国的基本战略	51
二	政府各部门的对华态度	53
三	中国形势的恶化	57
四	外交官的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	60
五	本国政府的反应	70
六	史迪威撤职问题	76
七	赫尔利政策与外交官	84
八	围绕艾切森提案	93
结 语		99
第三章	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访问	102
一	观察组的派遣	103
二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109
三	美国方面的观察结果	115
结 语		122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反美路线的确立过程	125
一	序 论	125
二	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势观	127
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对美态度	129
四	友好关系的发展	132
五	赫尔利政策与中国共产党	136
六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143
七	反美路线的明确化	147
八	反美路线的确立及其构造	152

第五章	1948 年对华援助法的成立过程	156
一	问题与观点	156
二	“ 中国政策 ” 的幅度	158
三	中国形势的恶化与对华援助论的高涨	160
四	国会特别会议中的欧洲临时援助法和对华援助 问题	162
五	1948 年援华法的成立	171
结 语		183
年 表		185
第六章	杜鲁门政府的台湾政策	188
一	序 言	188
二	杜鲁门的台湾 “ 不干涉政策 ”	190
三	台湾政策的动摇	194
四	向台湾海峡 “ 中立化政策 ” 转变	198
第七章	谢伟思前半生的活动	201
一	“ 麦卡锡旋风 ” 与亚洲政策	201
二	谢伟思的经历	203
三	谢伟思对中国的分析	205
四	对中共地区的观察	208
五	同赫尔利的对立	210
六	与 “ 不忠诚 ” 责难的斗争	213
第八章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意义	217
一	中国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提案的影响	217
二	日内瓦的中美会谈	219
三	作为转机的台湾海峡危机	222

四	华沙中美会谈	223
五	新提案的意义	225
六	打开中美关系的可能性	227
第九章	《美亚》事件与美国的对华政策	231
导 言		231
一	《美亚》事件的经纬	234
二	《美亚》事件的反响	244
三	麦卡锡的登场与《美亚》事件	250
四	《美亚文件》的发表	262
第十章	中美关系的转折	266
导 言		266
一	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新政策	267
二	中国的动向	269
三	大使级会谈的恢复	272
四	入侵柬埔寨与中美谈判的中断	274
五	对高级会谈的一致	275
六	政策转变与中国	282
七	基辛格特使的秘密访华	284
八	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	288
结 语		292
后 记		295

序 章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 1940 至 1970 年代的中美关系。这一时期虽不足 40 年，中美关系却经历了激烈的变化。期间，1949 年后两国长期处于断交状态，至 1972 年关系虽有所好转，正式建交却一直拖到了 1979 年。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时期。

因为本书的各章原来都是作为独立论文写成的，为便于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必要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各个年代中美关系的特点与问题。

一 1940 年代的中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年代的第一阶段。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同此前独自对日抗战的中国结成盟国。由此开始，中美关系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联系，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设于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美

国军队接连不断地开往中国^①，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军对中国军队实施武器、装备援助，并帮助他们训练。中美军队在缅甸共同作战。美国空军也活跃于中国国土。

在经济方面，以 5 亿美元借款为代表，美国给予中国种种支援和协作。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财政来说，美国的经济财政援助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政治方面，美国对本属中国内政问题的国共关系进行了调停。

大战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可归纳为下述两点：其一，支援中国，以维持和加强其对日抗战；其二，促成出现一个由国民政府领导的亲美的统一的中国。特别在后一点上，寄托着美国的这样一种希望：在日本没落、苏联作为大国登场的战后东亚，由国民政府领导的亲美的统一的中国能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支柱。

但是，中国的现实离美国的这种愿望越来越远。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军队的英勇抵抗曾在美国得到高度评价，蒋介石作为抗日中国的最高领导而声名远扬。然而，美国参战后，派遣到中国的许多美国士兵所看到的中国的现实，远远与他们原来的想像相反：因战争而疲劳不堪的无数贫民；见到美国人就企图以高价谋取暴利的商人；腐败、无能、懒惰的官僚。如此这般的现实，使美国人蔓延起一种幻灭感。

随着战争的持续，国民政府的腐败与衰弱日益严重，因而

① 到大战结束时，驻华美军达 6 万余人。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Times Runs Out in CBI*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my, 1959), p. 258.

无法有效对付日本军队的攻势。一方面，中日战争刚开始时尚势微力弱的中国共产党却明显地在抗战中壮大起来。国民党把它视作威胁而强化了内战的冲动。人们担心是否会在抗战成功之前即陷入内战。美国政府维持中国抗战和促成中国统一的目标与时俱危。

面对这种局面，美国驻华外交官开始重新研究形势与对策。他们主张：改变无限制地支持、援助国民政府的政策；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主义势力；接触和援助中国共产党。史迪威等人也支持他们的这些主张。但是，蒋介石对此坚决反对。二者的对立发展为 1944 年 10 月的史迪威撤职事件。其后，赫尔利（Patrick J. Hurley）担任大使。他排斥外交官们的主张，推行只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改善了与蒋的关系。然而，这只能使美国的政策越来越背离中国的现实（详见第二、第三章）。

1945 年 8 月大战结束。中国虽然被说成惨胜，但抗战终未崩溃，内战亦未爆发。在对外关系上，她在大战中成功地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且获得了五大国之一的地位。

但是，战争终结时中国的国土处于分裂状态：包括经济中心在内的广阔的沿海地区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国民政府退居于以重庆为战时首都的中国西南地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陕西省延安为据点，在西北地区和日军的占领区建立了许多解放区。

美国在大战以后也选择了深入参与中国内政的道路。首先，它为强化国民政府的力量而采取了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动员美军的运输机和船舶把国民政府的军队运送到沿海地区，并命令日军只向国民政府军投降，以图帮助后者尽可能多地接收日军的占领区；另一方面，由赫尔利大使居中促成蒋介石和毛泽东会谈，以图通过交涉而获得共产党的让步。结果，8 月下旬毛泽东赴重庆，实现了“重庆会谈”。10 月 10 日订立了“双十

协定”。但是，在军事方面，连中国战区的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司令也不能不于11月承认：尽管得到美军的援助，国民政府军队仍然不可能一举控制华北与东北。

接到魏德迈的这一报告后，美国政府重新研究了对华政策。结果，决定再次对国共进行调停。此时，赫尔利大使已于11月底辞职。12月，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发表声明，希望国民政府能把其基础扩大至其他党派，并表明将派遣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前往中国调停国共关系。

当时，虽然国民党内部主张以武力一举制服中共的意见很强烈，但有赖于美援的国民政府不可能轻易拒绝美国的意向。再者，反对内战的国内外舆论也很强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赫尔利的辞职和马歇尔的使华视作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在警戒之中寄与欢迎和期待。

在马歇尔的调停下，1946年1月国共缔结了停战协定，由各党派所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亦得以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与宪法草案等决议。马歇尔调停似乎取得了成功。然而，国共之间的军事纷争并未停止，尤其是在东北，因为国民政府调进了大量由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企图确立对该地区的支配权，因而扩大了同他们早一步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的冲突。到夏天，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内战。一度回国的马歇尔再次赴华，与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大使一起继续调停工作，却仍以失败而告终。1947年1月，马歇尔回国就任国务卿。

中国共产党最初欢迎马歇尔的调停，并表现出积极合作的态度。1946年1月至2月间的各项协定成立后，中共把它评价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开端。但是，国共军事纷争依然逐步扩大化。中共一边照旧同意交涉，主张履行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一边则以武装斗争对付国民政府军的武力进攻。此外，对美国，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了谴责，指出其一边推行调停国共

争端与援助国民党的两面政策，一边却在实际上支持蒋介石的内战。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国民政府的声明。其后，这类谴责美国的声明不断增多。与此同时，有关美帝国主义企图统治中国、使中国成为殖民地与附属国，以及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卖国贼之类的评论逐步公开化（详见第四章）。

内战前期，拥有美式装备和武器的国民政府军队保持着优势。马歇尔回国时，“国民党明显地到达了他们军事成功与统治区扩张的顶峰”（《美中关系白皮书》），至1947年3月竟占领了延安。但是，实际上此时国民政府已开始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招致不仅农民甚至城市市民阶层的反抗。不久，在军事方面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也跌入了困境。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反复要求美国政府提供包括10亿美元借款在内的大规模援助。

美国政府虽然在战后也继续着对国民政府的各种军事、经济援助，而且如同“杜鲁门主义”所表明的那样，加强着其反苏反共的对外政策，但对大规模援助中国，却并不积极。其原因可举出下述几点：①欧洲形势紧急，更需要大量援助；②因为国民政府的腐败与衰弱日趋严重，美国认为中国如不通过自我改革而改善体质，即使予以美援也收不到实效；③美国人意识到，过深地卷入中国的纷争很可能导致自己难以拔足。

与政府的态度相反，共和党的部分议员高唱积极援华论，以所谓“院外活动集团”为中心的亲国府势力亦在议会内外积极展开活动。这样，对华援助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焦点。

在这种情势下，1947年后期，美国国务院自己也开始着手计划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其原因，首先是中国形势的恶化，而比这更重要的，则是想对共和党的攻势来个先发制人，以及以援华换取共和党支持欧洲复兴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结果，1948年4月成立了总额达4.63亿美元的“1948年中国援助法”

(详见第五章)。

然而，这一援助并不能扭转中国内战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自1947年下半年起转入攻势，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在东北与华北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1949年1月进军北平，4月横渡长江，5月占领上海，最后于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形势如此飞速发展，美国与国民党自不待言，恐怕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出人意料的。

美国政府不喜欢共党政权。但它不能不直率地承认国民党政府^①的崩溃与新政权的胜利这一确定了的事实，不能不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思考他们今后的政策。1949年8月美国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就是这种动向的表现。白皮书的主题是想说明：尽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和它的政府仍然由于他们自己的腐败堕落而自我崩溃，而对美国来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通过这种解释，白皮书在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国民党的同时，将美国 and 国民党政府区别开来，以图承认中国新政权留下余地。在这中间，还包含着对中国“铁托化”的企盼和对离间中苏关系的期待。

二 对立的年代

1949年10月至1951年的两年，是决定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时期。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新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美国不得不从中国大陆完全撤退。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

^①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结束于1948年5月20日。因此，本书对1948年5月20日以前的中国政府，称之为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或国府；在此之后的，则称之为“中华民国政府”或国民党政府。